【社工实务】

大学生主体性危机的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基于焦虑代际传递的视角

汤顶华 刘 莹

【摘 要】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主体性危机频发，对其健康成长和社会适应造成威胁。本文运用焦虑代际传递理论，将对青少年主体性危机的分析置于家庭系统内，基于14个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案例，探析焦虑代际传递的个体、家庭及社会根源，并遵循家庭认知改变—家庭关系重塑—家庭赋权成长的服务逻辑，对大学生的主体性危机进行介入。研究最后探讨了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所面临的挑战，为未来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推进提出建议。

【关 键 词】大学生；主体性危机；学校社会工作；焦虑代际传递

【作者简介】汤顶华，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莹，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南京 211189)。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24.1.139～14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网络空间教育在学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号：23VSZ043)、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内在逻辑及有效路径研究”(项目号：21DJB005)的阶段性成果。

问题提出

作为青年群体的中坚力量，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并不理想，主体性危机频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学校社会工作主张将服务对象的需求放在具体的情境系统中进行分析，能够有效干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遗憾的是，既有文献未能对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过程进行深入探索。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认同，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介入应当突破个体视角，关注其家庭，尤其是父母的角色和影响；其中，焦虑代际传递视角指出，大学生主体性危机的产生与父母的焦虑情绪密切相关。[①]这一视角为理解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主体性危机的实践路径提供了指引。

本研究从焦虑代际传递视角出发，以高校社会工作实践案例为基础，分析大学生及其家庭焦虑的多重根源，探究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主体性危机的具体过程与策略，在弥补既有文献不足的同时，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推进提供建议。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大学生主体性危机与焦虑代际传递

大学生处于青春期向成人早期过渡的阶段，他们的自我同一性仍然比较模糊，孤立感也在不断增强，容易陷入迷茫甚至矛盾，进而陷入主体性危机，产生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②]家庭对于大学生主体性成长的影响已经在诸多文献中得到了证实。主流研究发现，焦虑可以在代际传递，通过父母的教养方式影响子女，进而引发大学生的主体性危机。[③]多数研究显示，焦虑的父母可能会对养育孩子的压力更加敏感，从而采取严厉惩罚、拒绝、过度保护、过度控制等消极的教养行为，这些教养行为预测了子女较高的焦虑水平。[④]在对父母教养方式的探讨中，父母

心理控制尤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父母心理控制，是指“父母入侵子女内心世界，忽视子女的情感，限制子女的表达，并通过爱的回收、内疚诱导等方式管理和监督子女，使子女的思想、行为、情感等与父母的要求一致”。[5]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抑制子女的自主需求，降低子女的自我效能感与成就感，威胁他们的主体性发展；越高的控制水平，越容易引起亲子关系的紧张甚至破裂，加重子女的焦虑和抑郁情绪。[6]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子女的成长，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呈现一定的变化趋势，当子女进入大学后，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达到峰值，使得父母与大学生围绕主体性发展的冲突尤为强烈。[7]

总之，学者们围绕大学生主体性危机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相关性开展了大量研究，验证了焦虑可以在代际进行传递。然而既有研究鲜少对父母焦虑情绪的产生根源进行探究，也缺乏对焦虑代际传递的社会文化情境分析。此外，文献对焦虑在代际传递的机制剖析不够清晰，尤其缺少基于大学生主体视角的焦虑代际传递研究。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介入中的学校社会工作

学校社会工作在教育机构中，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理论与方法，与家庭、学校、社区共同协作，解决学生面临问题，满足学生成长需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个人社会化和学校教育的目标。[8]目前，国内学界对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既有文献主要围绕三个议题展开探讨：第一个议题关注于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专业价值理念、专业理论框架以及专业工作方法被普遍认为是学校社会工作的核心优势；[9]第二个议题聚焦于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路径，有学者认为学校社会工作应该对大学生所处的系统进行区别性介入。[10]第三个议题着力于剖析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困境，专业地位边缘化、专业自主性受威胁、专业人才匮乏、专业本土化不足是限制学校社会工作效用发挥的主要挑战。[11]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多局限于理论探讨，实证研究阙如。同时，文献缺少微观层面对具体社会工作干预策略的阐释与分析。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大学生主体性危机、焦虑代际传递以及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主流研究未能就焦虑代际传递的社会根源和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也未能扎根实际案例，揭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实践过程与干预策略，这些既有研究的不足成为本研究的起点。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对学校社会工作实践案例的分析，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如何理解大学生及其父母的焦虑？(2)如何构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主体性危机的有效机制？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8位学校社会工作者提供的14个大学生主体性危机介入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大学生覆盖了不同性别、年级(大一至大四)、学科(理科、工科、医科、文科)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中等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样本内部异质性较高，能够为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研究者从8位社会工作者处获得了案例详情和他们的工作记录，并对这些社会工作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焦虑代际传递中的个体、家庭与社会

焦虑是个体在面对不确定的危险而又缺乏应对手段时的一种情感反应。不少学者认为，当前焦虑已经超越了个体范畴，成为一种普遍的、弥散的社会心态，具有了时代和社会特征。[12]因此，研究者引入焦虑代际传递视角，探寻焦虑产生的多重根源，对焦虑代际传递的机制进行分析。

(一)原子化社会中的焦虑个体

邹英等人指出，社会原子化是推动焦虑在中国社会中不断蔓延和深化的重要力量。[13]多位学者认为，单位体制消解后，城市中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附逐渐消退，社会治理模式转向“国家—社区—个人”，然而社区尚未能够建设完全，进而将城市中的个体推向原子化。[14]也有学者提出数字技术对个人日常生活数据的监视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方式，过去基于自我主体性的情感链接开始解组，数字化消解了社会整合，推动了社会原子化的发展。[15]

研究资料中，多位学生及家长都提及了社会原

子化趋势对他们焦虑情绪的影响。例如,在H案例中,H父亲习惯于全面管教H的学习生活,甚至在H上大学后,也要求H在学习安排、人际交往和其他校园生活中服从自己的要求。这种严格的管束使得H内心越来越抗拒与父亲沟通,甚至在与父亲通话前后出现心慌、头痛等症状。H父亲在会谈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解释:

可以说我心里是很不安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事情是没有把握的。不像以前是有集体给你兜底和依靠的,但是现在只能靠自己,我就很怕H万一走错了,后果就只有自己承担。(H父亲-H案例资料)

H父亲的言谈揭示出其对社会原子化的体验与解读,当前中国社会中,原有社会联结断裂,而新的社会联结尚未形成,个体失去了能为之提供归属与支持的情感联结与中间组织,个人与社会、国家的疏离增强了其不安全感和对子女未来的焦虑,进而带来了焦虑在这一家庭中的代际传递。[16]

(二)竞争内卷中的焦虑家庭

近十年中,中国家庭的教育焦虑不断增长并迅速蔓延,成为一种群体性情绪。[17]有近70%的家长认为自己教育焦虑程度较高,且这种焦虑覆盖了孩子从出生到入学再到毕业走向社会的全过程。[18]这种普遍性的家庭教育焦虑是对当前功绩社会中竞争与内卷制度的一种回应。基于绩效指标的个体评价体系、个体之间持续的竞争氛围,以及由此而生的内卷机制,共同催生了个体对自己处境和能力的焦虑;[19]个体始终面临被淘汰的焦虑,因而不断地学习和工作,焦虑作为推动个体自我消耗的动力在社会中蔓延,最终形成了焦虑社会。[20]遗憾的是,“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绩效成了主体新的焦虑来源”,[21]竞争与内卷的交互作用,促使焦虑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

对于家长而言,身处于这样竞争和内卷持续加剧的社会中,他们担心子女在某一阶段教育竞争中的落后,会导致其在未来生活中的失败。[22]因此,许多家长对子女进行密集式教养,对子女的学习结果进行量化考核,以期子女能够在教育竞争中胜出,从而缓解自己的焦虑。这种被焦虑催生的家庭教育模式,极易促使家长对子女的学习及生活进行过度设计和干预,甚至将焦虑传递给子女。[23]

本研究的资料显示,上述家庭教育焦虑具有弥散性特征,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阶层。[24]在高学历、高收入的中产家庭中,家长试图通过对子女学习和生活的掌控,阻止子女阶层滑落,维系家庭阶层地位。[25]例如I案例中,I的父亲学历优秀,事业有成,但I自己成绩平平,高考也只考入了一所普通高校。虽然父亲没有责骂他,I却从父亲对他前途的担忧和不时对亲友孩子的夸奖中感受到了他的焦急和失望,认为自己让父亲蒙羞。而在低学历、低收入的家庭中,家长迫切地希望子女能够通过学习摆脱当前困窘的生活状态,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甚至改变家庭境遇。例如B的案例中,B的父亲常年在外跑运输,母亲在家全职照顾三个孩子,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生活压力很大。B的母亲要求作为长女的B成绩名列前茅,为弟弟妹妹做好榜样。在B犯错或成绩不理想时,母亲对其批评责骂,甚至进行体罚。在母亲的教育下,B的自我要求十分严格,在准备保研面试时,因为担忧保研失败而十分焦虑,甚至出现了失眠和自伤的行为。

总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在竞争内卷中呈现出了差异化的焦虑代际传递机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中的父母焦虑子女因表现不佳而导致阶层滑落,因而带来了大学生对自己无法达到父母社会成就高度或难以满足父母高标准要求的焦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中的父母焦虑子女因竞争失利而难以实现向上流动,使得大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表现尤为焦虑。

(三)尚待完善的社会支持体系

焦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情绪,然而大学生及其家庭所享有的社会支持体系并不完善。焦虑的家长往往面临多重障碍,有着迫切的支持需求:家长们普遍对子女的焦虑缺乏察觉,也不知道该如何与子女相处;当子女因为焦虑在学业表现或是人际交往中出现问题时,家长们很容易感到挫败和无力。在焦虑代际传递理论看来,家长的心理状态和育儿方式对大学生的主体性成长至关重要;[26]然而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被个人中心模式主导,家庭对大学生焦虑的影响以及家长的需求时常被忽略,

干预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这一现状的形成有多重原因。首先,家庭视角的缺位使得干预对象被局限于大学生个体,校方与家长的联络与互动多围绕如何“解决”大学生本人的问题而展开,鲜少触及家长的心理需要或其他家庭困难。例如,J从小学开始就有较为严重的情绪问题,甚至在中学时出现过幻听的现象,然而当时她向父亲的求助时却被认为是为自己的懒惰寻找借口,只得到了父亲的斥责;当J自杀未遂后,J的父亲彻底崩溃,不知如何与女儿沟通。

J这个案例里,她父亲也是需要很多支持的。他自己成长经历里面没有接受过心理健康教育,不知道怎么处理女儿的这个焦虑。然后J试图自杀这件事,他自己也受了很大打击,等于他原来的很多认知被颠覆了,他现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跟女儿相处了。(2号受访社会工作者)

其次,家庭支持系统的碎片化使得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模式难以实现。大学生及其家庭需要来自学校、社区以及社会的多方支持,尤其是低学历、低收入的家庭,既有社会支持资源不足的问题,又时常面临家庭结构不完整、成员病重等挑战,家庭需求更加复杂。然而,当前高校内部机构与校外社会力量尚未形成协作机制,无法为大学生及其家庭提供体系化的介入与支持。2号社会工作者讲述了他目睹的一个案例,案例中的学生自大三开始厌学,逃课严重。当时学院辅导员多次联系学生的父母,希望他们中的一人能够到学校进行陪读,监督帮助学生改变现状;但学生家中经济状况不佳,陪读意味着父母其中一人失去收入,全家的经济来源受到重创。最终,学生的母亲仅来学校探望一次,未能陪读,而学生的状况迟迟未能好转,最终不得不退学,家庭再次遭受重击。

大学生主体性危机的学校社会工作介入

主体性的觉醒与塑造,是个体应对焦虑情绪,在原子化与不确定的社会中坚持前行、探索未来的基石。因此,对大学生主体性危机的干预至关重要。通过对调研资料的分析,研究者将学校社会工作对出现主体性危机的大学生及其家庭的介入分为改变认知、重塑关系和赋权成长三个阶段。

(一)改变家庭认知

协助家庭改变认知,帮助服务对象觉察其自主性危机的来源,是学校社会工作干预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有不少学生在社会工作者介入之前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来自家庭的压力是导致自己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对父母规划自己学业安排、就业方向甚至社会交往的不满在学生们的叙述中十分常见。不过仍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尚未能如此觉察,因此社会工作者在此阶段对于这些学生的介入重点,是帮助其厘清自己的“症状”与家庭的关联。例如在A案例中,A因自己在考研前出现的失眠和注意力分散等情况向社会工作者求助,而在与A的交谈中,社会工作者发现A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焦虑来源于母亲给予的压力,因而开始引导A思考自己问题的缘起。

社会工作者: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种特别紧张的状态的?

A:就是可能两个月前我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以后吧。我妈妈跟我说我表姐拿到保研资格了,说从小到大我都比不上我表姐。

社会工作者:打完电话,你有什么感觉呢?

A:就肯定是挺难受的吧。我能听到我脑子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叫我再努力一点。

社会工作者:能不能跟我描述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A:(闭眼回想)好像是我妈妈的声音。我小时候,在家里写作业,我要是停下来,我妈就会说我,说怎么不认真学习。就是这个声音。

社会工作者:这次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吗?

A:(回想)不是的,好像一直都在。这么多年了,我妈的声音一直都在,一直让我很痛苦。(哭泣)

(A案例资料)

A的哭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她终于清晰地觉察并承认了母亲对于自己的影响;在随后的介入中,社会工作者进一步帮助A挖掘出她情绪反应背后的信念,并鼓励她分析这一信念的形塑过程。当A总结发现,“和别人相比,我不够努力,我不够优秀”的想法是多年来困扰自己的非理性信念,母亲不断将她和表姐进行比较的行为模式是这一信念形成的根本原因时,她表现出了一种“痛苦的解脱”(1号

受访社会工作者),完成了自己认知的转变。

相较于部分学生的觉醒,几乎所有案例中的家长在社会工作者介入前,都未能意识到家庭对子女的主体性带来了冲击。当社会工作者向家长坦陈子女对于他们的控诉,或是提醒他们子女的问题可能来源于家庭时,“震惊”和“出乎意料”是大多数家长的反应。不少家长甚至会对此进行否认,坚称子女的想法不够成熟,指责子女未能理解自己的苦心:“我们一直很关心他,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没有亏待他,何至于此啊!”(M母亲-M案例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个案例中,家长都描述并骄傲于自己孩子十分“懂事、听话、乖巧”,对父母的顺从被许多家长视为教养目标和成效。许晶指出,中国教育文化中有一种培养儿童“取悦权威”的倾向。[27]案例中的家长们并未认识到这种顺从可能隐藏着孩子主体性的压抑和个人需求的牺牲。

在对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干预中,社会工作者应促使父母倾听孩子的声音,对自己的日常行动、所处情境与社会位置进行反思、批判乃至超越。本研究中的学校社会工作者发现,学生与家长之间身份的不平等使得他们的诉求难以得到家长的尊重,因此,构建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角色,在对家长的介入中尤为重要,是学校社会工作者争取与家长平等对话的权利、获得家长信任的常用策略。尽管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倡导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间要建立平等的专业关系,但是某些工作场域中的社会工作者仍然可以策略性地运用自身的权威性协助服务对象达成自助目标,甚至对于某些特定服务情境而言,社会工作者权威角色形象的树立对服务对象的改变不可或缺。[28]

学校社会工作者的权威性首先来自其在高校中工作的这一职业身份。相较于自己的子女,在高校中工作的老师更加容易获得家长的敬畏,老师的话语也更容易得到家长的重视。如5号受访社会工作者提到,自己和学生对家长说的话并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家长更加尊敬和信任自己,因此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劝说。其次,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经验同样建构了其专业权威性,也是其能够说服家长改变认知的关键要素。例如在C案例中,C已经被诊断为躁郁症,但是其父亲一直否认孩子有心理问题这一事实。社会工作者和C父亲进行多次交流,分享了多个学生案例,向其说明及时介入的必要性。最终,社会工作者所展现出的丰富的工作经验使他获得了C父亲的信任。

(二)重塑家庭关系

有学者认为,家庭关系对青少年自我的形塑有重要影响,因而青少年社会工作干预的关键是对不良的家庭关系模式进行审视和重建。[29]本研究的14个案例中,学生与家长间的亲子关系也呈现出情感疏离的特征:家长与学生间的沟通多围绕具体的目标展开,例如学生的专业选择、学业成绩、社团表现、朋友交往、未来规划等,鲜少直接地表达对彼此的感情,许多学生甚至有意回避与家长的情感交流,不再向家长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与感受。

在与学生的沟通中,社会工作者们进一步发现,这种亲子间情感的疏离源自学生在家庭关系中感受到的压力:无论家长是否宣之于口,学生们都从他们的焦虑的言行举止和不安的家庭氛围中感知到了家长对自己“懂事听话”“学业优秀”“事业有成”“让父母有面子”等强烈期望。学生们将家长的焦虑内化,认为满足家长期望是自己的责任。而当学生们的自我逐渐成长,发现自己难以满足家长要求,或是对自己前程的规划与家长期待不同时,他们感到愧疚,不断自我攻击。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挣扎中,部分学生最终选择压抑真实的自我,顺从家长的意愿;另一些学生则在对抗家长的同时,难以面对心中的自责,走向了自我放逐。因此,帮助学生与家长重塑亲子关系,重构彼此之间的亲密与信任,强化家庭内部的情感联结,是学生自主性得以成长的基础,因而成为社会工作者在这一阶段的介入重心。

以K案例为例,在社会工作者介入该案例时,K已经面临退学风险,而他的父母已经对儿子绝望,认为其“既不努力也不孝顺”,声称要放弃这个儿子。经过多次会谈,社会工作者终于打开了K的心扉。K哭诉道,自己一直都很渴望父母的认可,但是不知该如何面对失望的他们,心中内疚的同时,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现状,不断责备自己让父母蒙羞,最终陷入自暴自弃的恶性循环。社会工作者将K的真实感受转达给了其父母,K妈妈当场痛哭流涕,爸爸也忍不住

落泪，他们从未意识到K对自己如此依恋和愧疚，而是将K对他们的回避和反抗误认为不孝，从而与儿子越来越疏远。与K父母的此次会面，是K案例转变的关键契机，K父母重拾对儿子的爱意后，一改过去的消极和抗拒，主动配合社会工作者的介入。

当家长与学生建立了较好的互动基础后，社会工作者与学生、家长共同会面，鼓励学生向父母袒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双方共同探讨学生对父母所怀有的纠结而矛盾的感受，并引导家长倾听和回应学生的情绪。

社会工作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伤害自己的？

B：记不清了，但我做得让自己不满意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惩罚，像我妈曾对待我的那样。

B母亲：(低头，自责)我确实对你很严厉，觉得你作为家里的长女，把你带好了可以给弟弟妹妹做好榜样。但没想到竟让你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社会工作者：B，能不能坦诚地告诉妈妈，当她打骂你以后，你的感受？

B：(委屈，哭泣)明明除了打骂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你偏偏选择最为极端、最省事的方式。我又不是没有感情的机器，相比严厉的打骂我更需要关心和爱。

社会工作者：听到B的说法，妈妈你有什么感觉？

B母亲：(哭泣)对不起孩子，你作为家里的长女承受了很多压力，是妈妈做得不好。

(B案例资料)

紧接着，社会工作者促使学生和家长进行自我探索，将自己的想法与对方的期望进行区分，启发家长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指引家长肯定学生作为独立个体发展并表达自己诉求的正当性，支持学生更多关注自己的需求。在A案例中，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A和母亲反思考研这一选择对双方意义的差异，A再次审视了自己的内心，觉醒发现她的行动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而非满足母亲的期待，她找到了自己考研的内生动力，焦虑有了显著的缓解。

(三)赋权家庭成长

在前两个阶段中，家庭的认知产生了改变，家庭的关系得到了重塑，学生的自我逐渐觉醒，他们作为个体的诉求开始得到自己和家长的正视。但是社会工作者发现，几乎所有案例中的学生，都有着极低的自我评价，“我不够优秀”“我不如他人”等话语在他们的叙述中屡见不鲜；学生们虽然关注到了自己的诉求，却缺乏足够的自信，认为自己缺乏自我成长、为自己决策的能力。与此同时，很多家长也面临应对自己焦虑情绪、改变自己教养方式、协助孩子自我成长和处理家庭其他问题等多方面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干预中，对整体家庭的支持至关重要。[30]因此，在第三阶段，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的核心目标是赋权大学生及其家长，满足家庭多样需求，促使家庭得到整体性成长。

针对学生缺乏自信的问题，社会工作者邀请学生和家长一起回顾学生的成长经历，启发他们挖掘学生身上的优点，提高学生对于自我的评价，帮助家长增强对学生自主成长的信心。7号受访社会工作者对于L案例的介入可以清晰地展现赋权工作方法的成效。在与社会工作者交谈时，L总是觉得自己非常糟糕，焦虑于自己不能在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中取得让母亲满意的名次。而社会工作者从L的陈述中发现，她自中学开始一直非常努力学习，于是围绕努力这一优点，对她进行赋权。

L总是说自己很差劲，以前高中的时候自己晚上还可以学习到1点多，但是现在备考状态就很差，学不进去。我觉得可以从这里入手，所以就说，“你晚上学习到这么晚，在我看来你非常努力”。L跟她妈妈突然被点醒一样，意识到了L努力的这部分特质。然后我引导她们俩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现在L身上还有没有努力这个优点？努力能不能帮L应对现在的考试？然后她们俩发现L原来的那些优点现在还是在她身上的，这种自己很努力的认知缓解了L的焦虑，L妈妈也发现了女儿的优点。(7号受访社会工作者)

而在M案例中，对M母亲的心理支持和亲子互动模式调节则是社会工作者赋权家庭的主要内容。由于M旷课情况严重，在学院辅导员的建议下，M的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进行陪读。但是陪读过程中母子两人的互动依旧问题重重：M担忧母亲会继续控制自己，因此十分抵触母亲的陪伴；M的母亲则为他的学业情况十分着急，却不知该如何与儿子相

处。社会工作者帮助M和妈妈协调找到了双方都认可的陪读方案,抚慰M妈妈的焦虑情绪,引导M妈妈倾听孩子的烦恼,教授M妈妈平等沟通的技巧。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双方相处和谐并日渐亲密,M的焦虑大幅减轻,学业表现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还有社会工作者关注到了部分家庭因生计困难、家人患病等原因而产生的特殊需要,为这些家庭链接各类社会资源,帮助这些家庭获得更多社会支持。例如N案例中,N的父母几年前离婚,父亲在工地打工,工作辛劳且收入不稳定,家庭经济状况不佳;N的妹妹患有重病,常年由奶奶照顾。N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的境遇,拼命学习,却在进入大学后发现自己的排名不如高中,为此十分沮丧和焦虑。当妹妹再次住院手术时,对家庭的担忧和对自己的失望交织,让N情绪崩溃,难以维持学业。当了解到N的情况后,社会工作者除了为N提供心理疏导之外,还联络了N家庭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和N妹妹所在医院的社会工作者,为N家庭寻找所有可能的援助。最终,在医院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N妹妹获得了医院基金会和一家社会组织的救助,手术费用得以减免,N与家人的压力减轻,N的父亲也能够请假到学校中探望N,与社会工作者一起处理N的焦虑情绪。

(四)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困境

尽管前文中的社会工作者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性,帮助不少案例中的学生与家长获得了改变与成长,但在实际的介入过程中,学校社会工作者面临诸多挑战,介入失败或被迫中止的案例也并不罕见。

专业角色不明是学校社会工作者们面临的首要挑战。当前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尤其是高校社会工作尚在起步阶段,高校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认知、认同与接纳有限,社会工作在高校中的嵌入制度尚未形成。学校社会工作者的加入冲击着高校原有的职能划分体系,在尚未建立成熟的分工与合作机制前,社会工作者时常对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边界产生疑惑,不少人甚至被指派承担行政文书、思政教育等工作,占据他们的服务时间。

其实辅导员、心理老师做的事情跟我有很多重合的部分,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有点困惑,就是有点搞不清楚我和他们的区别了。(3号受访社会工作者)

专业介入依据的缺乏是学校社会工作者们遇到的另一障碍。多位受访者谈到,目前无论是政府文件或是学校政策,都未能为社会工作对高校学生的介入提供明确依据,学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合法性模糊。尤其困扰社会工作者的是,有相当数量的学生面临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亟需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与干预,但是学生的送医需要作为监护人的家长的同意,社会工作者不能强制学生接受治疗;然而并非所有家长都愿意听从社会工作者的建议或是配合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严重影响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成效。

那个J案例,她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们建议要去医院,但是她爸爸坚持不同意。后面还好是J自杀未遂,否则她爸爸很可能要来找我们麻烦。(6号受访社会工作者)

如6号受访者所言,在没有政策文件作为介入依据的情况下,学校社会工作者面临权责不对等的困境:一方面,他们对学生的干预很多时候倚赖于家长的配合,在家长拒绝合作时,社会工作介入难以推进;另一方面,他们承担了家长"解决所有孩子的问题"的期待,当介入未能成功时,可能面对家长的责难甚至是追责。

结语

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主体性危机频发,威胁其健康成长与社会适应。本研究在焦虑代际传递理论的指引下,将青少年主体性危机的分析置于家庭系统之内,关注大学生与家长的互动。基于对14个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案例的分析,研究认为,大学生及其家庭的焦虑情绪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由社会原子化趋势、竞争与内卷机制以及家庭支持体系的不足共同形塑而成。学校社会工作以大学生及其家长为服务对象,遵循认知改变—关系重塑—赋权成长的服务逻辑,对大学生的主体性危机进行介入。最后,研究对当前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大学生主体性危机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本研究揭示了学校社会工作干预大学生主体性危机的路径、过程与成效,对既有研究进行了补充。研究发现印证了家庭视角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干预中的重要性,并为相应干预实践的推行提供了建

议。未来研究应在学校社会工作的本土理论发展与实践体系建构上不断深化，明晰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角色，规范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依据，推动社会工作成为支撑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键力量。

此外，尽管本研究中学生的主体性危机在大学时爆发，但案例资料显示，这一危机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追溯到其青春期时甚至更早的童年时代，源于其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对父母焦虑的学习与内化。因此，应当在高校社会工作的介入之外，建立青少年主体性危机的预防模式，加强对父母育儿方式的指导与监督，提升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监测与干预，完善多元主体协作的家庭支持系统。

注释：

①佟新：《顺从与反抗：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及其整合——社会工作对平权型亲子关系的倡导性实践》，《学海》2022年第1期。

②王树青、佟月华、苏霞：《社交网站自我呈现与大学生自我认同》，《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③石利娟、邝翩翩、罗学荣：《父母焦虑及其情绪调节对青少年焦虑影响的网络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9年第6期。

④于宜民、张文宏：《现代性焦虑下个体的自我呈现》，《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⑤B. K. Barber,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Revisiting a Neglected Construct", *Child Development*, Vol. 67, No. 6(1996), pp. 3296-3319.

⑥赖雪芬、王艳辉、王媛媛等：《父母控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年第3期。

⑦邓旭阳、刘晓刚、刘取芝等：《父母心理控制与大学生学习投入及负性情绪的关系：挫败感和应对效能的链式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23年第1期。

⑧张燕婷、杨发祥：《学校社会工作嵌合发展的演进逻辑与实践策略》，《学海》2023年第2期。

⑨何雪松、吴蓉：《组织化的自我实现：高校社会工作的一个视角》，《学海》2022年第4期。

⑩何雪松、杨超：《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政治、文化与实践》，《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⑪洪佩、王杰：《学校社会工作的入场困境与实践策略——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分析》，《社会工作与管理》2016年第6期。

⑫陈云松、潘雨、张亮亮：《当代中国的社会焦虑及其宏观机制——基于搜索大数据的省级面板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⑬邹英、向德平：《风险理论视域下原子化社会的个体危机及其化解途径》，《新视野》2016年第6期。

⑭田毅鹏：《后单位时期社会的原子化动向及其对基层协商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⑮封钰：《间性论视域下的数字人文—— 一种对于数字技术的新的思考》，《学海》2023年第4期。

⑯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⑰杨雄：《AI时代"教育内卷化"的根源与破解》，《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

⑱耿羽：《莫比乌斯环："鸡娃群"与教育焦虑》，《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11期。

⑲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74页。

⑳海因茨·布德：《焦虑的社会：德国当代的恐惧症》，吴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87页。

㉑蓝江：《功绩社会下的倦怠：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理论月刊》2022年第7期。

㉒陈华仔、肖维：《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症"现象解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㉓郑广怀：《教育引领还是教育降维：社会工作教育先行的反思》，《学海》2020年第1期。

㉔洪岩璧、赵延东：《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㉕鄂翌婷、杨建科、张骏：《"起跑线"的内卷：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

㉖张立群：《"代际"的出场与其存在的"焦虑"——关于新世纪一种文学现象的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㉗许晶：《道德从何而来：心理认知人类学视野下的儿童道德发展研究》，《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4期。

㉘Elliot Studt, "Worker-Client Authority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Vol. 4(1959), p.25.

㉙张振宇：《生命历程视角下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健康的影响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㉚楚啸原、理原、王兴超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关系：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与性别因素的调节作用》，《心理科学》2019年第4期。